

DOI:10.14073/j.cnki.nywtj.2022.03.006

中美战略竞争下泰国的“非中性”对冲： 特征、成因与趋势

周方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泰国一再重申传统对冲策略,但从中美泰三角关系走势来看,近十年来其战略重心明显朝着友华方向偏移。泰国“非中性”对冲源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内生张力,呈现“以‘泰式民主’保守意识形态为基准,以经济与安全为两翼,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纵深”的基本特征。从中长期来看,为防范泰国“非中性”对冲反转,有必要从地理连通、产业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进一步夯实中泰战略合作根基。

关键词: 中美战略竞争; 泰国“非中性”对冲

中图分类号: D83/87.3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22)03-0067-14

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全面深化落实印太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在过去十多年里持续升级。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在中美地缘政治压力下,遵循传统外交理念一再重申对冲策略。但从近十年的走势来看,泰国被认为存在“友华疏美”立场。那么,泰国“非中性”对冲成因何在?未来将如何变化?本文将就此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泰国对冲策略的“非中性”立场与友华趋势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持续升级。^① 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拓展其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的适用范围,并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重构地区秩序”。^② 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正通过举国体制推行长期战略主张权力,并将继

收稿日期: 2022-01-04

基金项目: 2022年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泰国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周方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法学博士。

^① ศิวพลละอองสกุล, “จีน-อเมริกา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กันทางอำนาจในศตวรรษที่ 21”, คณะรัฐศาสตร์วิทยาลัยรัฐกิจ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งสิต (西瓦蓬·腊翁萨谷《21世纪中美战略竞争》,《农业大学政治学评论杂志》, Vol. 6, No. 1 (2019), pp. 298-323.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 25.

续推进军事现代化,从而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权。”^①2019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在讨论“印太战略”面临的挑战时,将“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列为四大挑战之首,指责中国“军事现代化及强制性行动”,以及“利用经济手段谋求战略利益”,从而将影响甚至取代美国在印太及全球的主导权。^②2021年3月,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指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③并形成了“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须敌对时敌对”的对华战略方针。^④2022年2月,拜登政府《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正在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在印太地区谋求势力范围,寻求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大国”,并要求在全球“建立有利于美国、盟友及伙伴的影响力平衡,建立有利于我们共享利益与价值观的影响力平衡”。^⑤

2018年被普遍视为中美关系跨过所谓“历史十字路口”的重要时间点,^⑥从此中美两国关系步入“新时代”,既不同于中美建交后四十多年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前期的“前天”。^⑦美国政治精英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对华接触”问题上抱有共识,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再次转向权力政治逻辑,开始运用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舆论战等强硬手段,从而对地缘政治产生明显压力。^⑧

作为传统上的美国军事盟友以及地理上的中国近邻,泰国对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地缘压力感受尤为明显。^⑨巴育政府在《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2019—2022)》中强调指出,美国当前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地缘战略挑战,必将在美日印澳“四方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安全合作,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冲突与摩擦,使泰国要保持地缘平衡变得更为困难,并会面临更严峻的不确定性安全风险。^⑩为此,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第一部分“安全事务”中明确指出,“泰国必须致力于维持与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关系平衡”,应对全球多极化进程中的不稳定性安全风险。^⑪并在第二部分“外交事务”中强调,未来20年大国力量在本地区战略博弈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将会对泰国产生日益显著的“站队”压力,

① Jim Mattis,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9, 2018, p. 2.

②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June 1, 2019, pp. 7-10.

③ Joseph R. Bide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 8.

④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⑤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February 2022, p. 5.

⑥ 牛军《轮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演变(1978~2018)》,《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第24页。

⑦ 刘建飞《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页。

⑧ 秦亚青《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学术前沿》2021年第15期,第61-69页。

⑨ นุชิตี ศรีบุญสง, “แนวทางการกำหนด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ต่อผลกระทบ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 ด้านการทหารระหว่า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กับ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รัฎฐาภิรักษ์ วารสารราย(努齐德·诗丽布恩颂《泰国应对中美军事关系影响的战略制定指导方针》,《泰国国防学院杂志》), Vol. 62, No. 1 (2020), pp. 8-28.

⑩ นโยบายและแผนระดับชาติว่าด้วย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ห่งชาติ พ.ศ.๒๕๖๒-๒๕๖๔ 《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2019—2022)》,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泰国总理府,《政府公报》第136卷第124辑, 2019年11月22日, 第3-4页。

⑪ การประกาศแผนแม่บทภายใต้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ชาติ (พ.ศ.๒๕๖๑-๒๕๘๐) (๑) ประเด็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 《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 第一部分·安全事务》, 泰国总理府,《政府公报》第136卷第51辑, 2019年4月18日, 第27页。

必须采取有效举措保持外交平衡战略。^①

如果通过“地缘引力结构”框架予以评估,那么从东南亚各国的横向比较来看,当前中美两国对泰国的影响力基本持平,既区别于中国影响力占优的缅甸、老挝与柬埔寨,也不同于美国影响力占优的新加坡与菲律宾。对泰国而言,中国在地理历史指标上影响力显著占优,并在经贸合作指标上略有优势;美国则在军事安全与社会文化的两项指标上优势明显;而在政治信任指标上,中美两国影响力基本持平。^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泰国在中美“地缘引力”之间呈现的均衡态势,事实上是冷战中后期以来中美泰三角关系架构中,泰国从极度“亲美”到相对“友华”的回摆过程。^③尤其是在过去10年,尽管泰国反复重申“大国平衡”的传统外交立场,但在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甚至总统连任后首访泰国情况下,中美泰三角关系的战略重心依然朝着友华方向偏移。对此,有泰国学者颇为直观地形容,“今天暹罗小姐(泰国)已经做好准备,离开‘山姆大叔’(美国)投身北京‘阿哥’(中国)的怀抱”。^④

目前来看,中美泰三角关系正处于微妙的关键节点。一方面,作为非对称性三角关系的两大施力方,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从而使得泰国作为受力方,面临日益增强的地缘引力牵扯;另一方面,冷战时期曾经严重偏向亲美侧的三角关系战略重心,逐渐回摆到均衡位置,从而使泰国社会情绪开始接近“反转”的心理临界点,有可能对曾经习以为常的状态改变产生疑虑、担忧甚至畏缩。于是,泰国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时代”背景下将如何抉择——究竟是延续友华侧的“非中性”对冲,还是转向不偏不倚的“中性”对冲,亦或在美泰关系“十字路口”^⑤回归亲美侧的可能性,日益受到地缘政治博弈各方关切,并成为学术讨论与政策研判的重要议题。

二、打开“黑箱”:着眼于中小国家内生因素的分析框架

通常情况下,有关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研究,都会将中小国家视为常量的单行为体,先验式地假定中小国家具有内在稳定的(国家)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预判中小国家对大国战略竞争的外部影响可能产生的应激反应。客观上,此类做法有其合理性。毕竟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的体量与中小国家特别是小国相去甚远,因此在非对称“地缘引力结构”影响下,大国事实上主导着“施力—受力”关系及其发展走势,从而使相关研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中小国家细节性的变量特征,却不至于明显影响研究结果。

但问题在于,有关中小国家内在稳定性的先验式假定,有可能并不成立。尽管在常态下,中小

① การประกาศแผนแม่บทภายใต้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ชาติ (พ.ศ.๒๕๖๑-๒๕๘๐) (๒)ประเด็น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第二部分·外交事务》) 泰国总理府,《政府公报》第136卷第51辑,2019年4月18日,第3-4页。

② 有关“地缘引力结构”概念及相关讨论,参见周方治《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东南亚“地缘引力结构”解析:路径与方法》,《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63-71页。

③ Benjamin Zawacki, *Thailand: Shifting Ground between the US and a Rising China*, London: Zed Books Ltd, 2017.

④ สุชาติ บำรุงสุข,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พิเศษ ไทย-จีน ภูมิทัศน์ใหม่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มติชนสุดสัปดาห์ (素拉差特·邦穆鲁萨克《中泰特殊关系:泰国外交新局面》,《民意周刊》), 2017年7月6日, https://www.matichon-weekly.com/column/article_43670.

⑤ Kitti Prasirtsuk, “An Ally at the Crossroads: Thailand in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Michael Wesley (ed.),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nberra: ANU Press, 2017, pp. 115-132.

国家的内生性变化相对缓慢甚至难以觉察,从而为先验式假定提供了可行支撑;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内生性的重要变化。^①

这就使得在理解和把握泰国对冲策略及其变化趋势时,有必要打开单一国家行为体“黑箱”,从而在“大国外因—小国内因”的互动框架下形成更贴近现实的分析研判。为了更直观认知泰国对冲的行为逻辑,本文基于“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理论前提,以对象国政治权力结构为立足点,建构了中美泰三角关系的非对称性互动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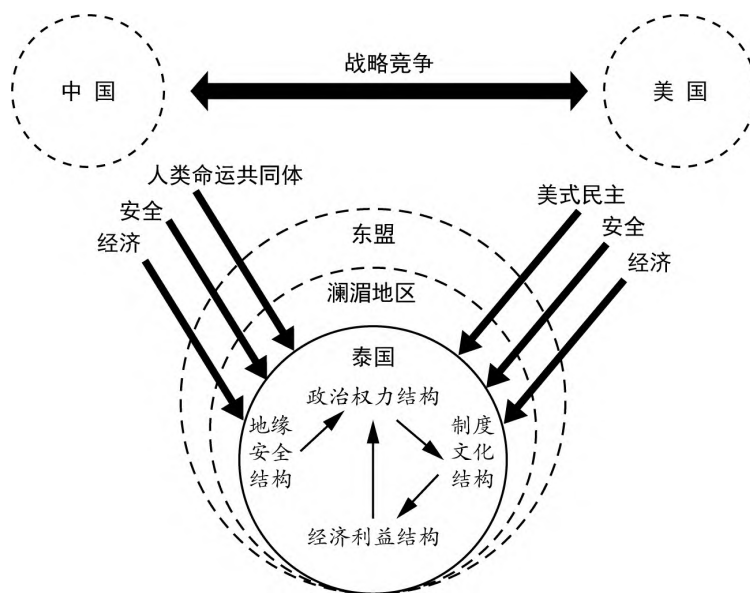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泰三角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1所示,随着打开“黑箱”,作为非对称性受力方的泰国如何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也就转化为在泰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掌握核心圈层主导权的政治权力集团如何选择的问题。^②换言之,亦即作为施力方的中美两国外因是如何作用于泰国内生因素,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其政治主导集团的问题。

回顾自冷战时代以来泰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变化,可以得到其政治主导集团以下的行为逻辑:

首先,以确保主导地位作为内政外交决策的最优先考量。对于政治主导集团而言,掌握政治权力核心圈层的主导地位不仅意味着占据更多的国家资源分配权,而且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政治权力集团的支配地位。因此,任何政治主导集团都会尽其所能固守主导地位,否则不仅会失去既得利益,而且有可能被新兴权力集团所支配,甚至被政治清算。这就使得政治权力集团在进行内政外交决策的时候,始终会以确保政治主导地位作为最优先考量,但凡存在威胁其政治主导地位的风险因素,都会引发强硬甚至激进反应,并不惜付出内政外交的沉重代价。

通常情况下,影响政治主导地位得失的主要有两大类风险因素(见图1):一类是外源性的地缘安全因素。冷战前期,泰国在外交上倒向美国,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南半岛极左翼运动浪潮汹涌,使

^① 有关东南亚国家内生性变化讨论,参见周方治《东南亚国家政治多元化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52-80页。

^② 有关政治权力结构“同心圆”模型讨论,参见周方治《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基于权力结构“同心圆”模型的东亚政治转型研究》,《探索》2013年第5期,第70-74页。

得保守阵营深切感受到政治主导地位被彻底颠覆的可能性持续上升。于是,在日益失衡的地缘安全结构影响下,泰国选择了亲美立场并参加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冷战中后期,随着越战失败,美国既无意也无力在中南半岛为泰国提供安全保障,于是,面临越南侵柬压力的泰国,基于相同行为逻辑,采取了对华友好的外交回摆,转向中国寻求更可靠的安全支持。

另一类是内生性的权力结构因素。随着泰国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各类新兴权力集团渐次形成和壮大,并开始谋求更多的政治话语权,甚至是核心圈层主导地位。20世纪中后期以来,曼谷政商财阀、地方豪强、城市中产阶级、新兴资本集团等,相继成为动摇传统上王室一保皇派与军人集团政治主导地位的风险因素,并不断引发保守阵营以政变方式固权。^①不过,由于保守阵营通过“扩容”方式,总体上延续了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冷战以来泰国在政治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多次出现内政外交变动,但通常都会在保守阵营固权后回摆复位。

其次,以是否有利于固权为标准有选择地对接外来观念。对于政治主导集团而言,在解决了最优先的主导权问题后,顺次要解决的是依托制度文化的观念约束,而不是暴力强迫划分权力边界,以保证固权的“成本—收益”最大化(见图1)。于是,但凡发生成功政变,泰国通常都会随之颁布新(临时)宪法,结果就是从1932年到2017年的85年间先后出台了多达20部(临时)宪法。不过,宪法频繁废立,也使得泰国制度文化结构中的非正式安排/潜规则,很大程度上要比正式安排/显规则更具有持久性和影响力。

泰国保守阵营从冷战时代起,就在持续打造“泰式民主”观念,作为巩固其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从“民主”称谓来看,似乎在回应美西方“民主”观念,但其表述重点在于“泰式”而不是“民主”。对此,有学者指出,“‘泰式民主’体现的是一种舶来物(主要是西方)与本土化观念的冲突,从本质上说,它们矛盾的焦点在于争夺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更好地为掌权服务。”^②

冷战期间,泰国保守阵营与美西方看似融洽的观念共识,主要是建立在抵制极左翼思潮的基础之上。泰国政治主导集团从美西方输入的意识形态之中,选用了“反共”意识,但却婉拒了“美式民主”观念,仅抽取了空泛的“民主”称谓,并将其本土化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外壳”。

最后,以对外经济合作的不均衡性为手段强化主导地位。对于政治主导集团而言,参与分配国家资源以获取发展红利是事关凝聚力的核心要务,因此总体上会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持积极立场,以期获得更多的增量发展红利。但问题在于,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红利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而是很大程度上与各方要素禀赋特别是对接国际市场能力相关。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加以区别对待,那么通常情况下缺乏适应度和灵活性的政治主导集团,就很有可能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一方面享受着发展红利增量部分的绝对收益,但另一方面也要承受红利分配权重下降的相对成本,以致中长期面临影响力下降的不利前景(见图1)。

于是,政治主导集团通常都会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趋利避害”,以保证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双丰收”,并将相应成本转嫁给其他社会群体。换言之,如果不是政治主导集团通过自我调整适应了新的对外经济模式,从而有能力获取主要份额的发展红利,或是新兴权力集团通过政治博弈跻身核心圈层,成为原有保守阵营的对等合作者甚至盟友,那么对外经济合作就很难取得结构性的深化发展。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的国营工业化,到60年代的民营化进口替代,到七八十年代的外向型产业升级,到90年代的全面自由化,再到21世纪以来“他信经济”与“充足经济”的道路竞争,无不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相伴相随。^③

① 周方治《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8页。

②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6页。

③ 周方治《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进程、路径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第16-24页。

三、当前泰国“非中性”对冲的特征与成因

泰国当前的外交立场选择,一方面传统外交理念与偏好的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取决于政治主导集团对内外情势“利己性”感知与判断。前者在宏观上具有政治正确的共识约束,从而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泰国外交底色——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社会精英特别是技术官僚集团拥有强烈的“外交自信”,使其在面对大国博弈时,既不会被动采取顺从的“事大主义”,也不会消极回避甚至试图与各方拉开距离,而是会积极主动对冲以争取更多筹码,拓展在大国罅隙间的生存空间。后者在微观上呈现接地气的操作性,从而直接决定了泰国外交纹理,形塑了当前以“泰式民主”保守意识形态为基准、以经济与安全为两翼、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纵深的“非中性”对冲。

(一) 以“泰式民主”保守意识形态为基准

尽管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广度、深度和烈度都呈上升趋势,但对经历过殖民时代英法对峙、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以及冷战时期中南半岛热战的泰国而言,地缘安全结构还处于红线范围之外,尤其对保守阵营的政治主导集团而言,并不像当年极左翼运动浪潮那样构成颠覆性的现实威胁,从而尚未对泰国外交立场产生足以改变底色的直接影响。对此,巴育政府在2019年出台《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2019—2022)》时,一方面指出本地区存在大国博弈引发冲突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却表现淡定,相关应对部署的优先度排序,不仅赶不上国内维稳和南疆反分裂议题,甚至还要落后于环境、能源、食品等社会安全问题。^①

不过,中美战略竞争的外部因素,还是与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内生因素产生互动,从而间接影响泰国外交纹理的脉络走势。从21世纪初开始,泰国保守阵营的核心圈层主导地位面临来自新兴资本集团的强有力挑战。作为新兴资本集团政治代表的他信派系,依托民粹主义的“草根政策”,争取了中下层选民特别是农村民众支持,从而建构起“资金+选票”的胜选模式,甚至一度成立了史无前例的“一党政府”。泰国保守阵营的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与曼谷政商财阀“铁三角”为压制他信派系,先后两次发动政变,并施行了长达5年的军政府统治。^②从时间跨度来看,泰国保革对立的“红黄大战”及“巴育夺权”时期,恰好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上升阶段。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无可避免地将外因卷入了内因,并通过内因影响泰国外交立场的取舍偏好。

中美两国对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引发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动荡,秉持泾渭分明的外交立场。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始终坚信泰国有能力处理好国内问题;与此相对,美国奉行“民主”价值观外交,反对泰国以政变方式解决分歧。2014年巴育政变上台后,美国采取了强硬立场,不仅暂停了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T)和外国军事融资(FMF)项目下的数百万美元援助,而且大幅减少双边高层互访。2015年初,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访泰期间,甚至在朱拉隆功大学演讲中公开批评巴育政府。^③

这就使得泰国保守阵营在过去十多年的政治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政治抵制下,被动选择了“友华疏美”的外交立场。201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举行大选后,巴育依托《2017年宪法》的相关制度安排成功以“民选”方式连任总理,从而标志着保守阵营在政治主导权

① นโยบายและแผนระดับชาติว่าด้วย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ห่งชาติพ.ศ.๒๕๖๒-๒๕๖๘ 《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2019—2022)》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泰国总理府,《政府公报》第136卷第124辑 2019年11月22日 第4页。

② 周方治《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 第1-28页。

③ “Remarks of Assistant Secretary Daniel Russel”,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January 26, 2015, <https://th.usembassy.gov/remarks-of-assistant-secretary-daniel-russel/>.

竞争中达成阶段性目标。不过,泰国形式上回归“民主”并不意味着横亘在泰美之间的政治分歧迎刃而解。对泰国保守阵营而言,当前正面临更棘手的新难题,即如何在拉玛九世驾崩后的政治极化状态下重构“泰式民主”社会共识。^①

相较于“红黄大战”时期的保革对立,2019年大选后泰国的政治光谱更为复杂,社会分裂也更为严重。其中,以拉玛十世为核心的极右翼势力,以军人集团巴育—巴威派系/人民国家力量党为核心的中右阵营,以新兴资本集团他信派系/为泰党为核心的中左阵营,以新兴资本集团塔纳通派系/前进党(原新未来党)与新生代反政府运动为代表的极左翼势力,彼此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关系,尤其是新生代极左翼运动,甚至将斗争矛头直指君主制,引发保守阵营强烈不满与不安。

尽管从2020年到2021年相继举行的府、自治市、乡镇街道的行政机构主席及委员会成员选举来看,泰国保守阵营在泰国地方特别是基层的影响力依然根深蒂固;但是,2019年国会众议院选举中极左翼势力的异军突起,以及新生代街头反政府运动的持续发酵,却使得保守阵营深刻意识到,必须在《2017年宪法》有关国会参议员全部任命产生并与众议员联席推选总理的5年过渡条款失效前,依托“泰式民主”潜规则划定权力边界,以巩固经由政变重塑的政治权力结构。

为此,泰国保守阵营一方面在神圣王权的传统观念基础上,努力打造拉玛十世专属的“亲民”形象,甚至以极罕见的国际媒体即兴采访方式,经由拉玛十世传递了“泰国是和解之地”的政治信号;^②另一方面则以强硬立场,全面整肃“美式民主”影响,不仅通过司法手续解散了新未来党,并禁止塔纳通等极左翼人士从政10年,而且采取制定《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开展“净网”行动,严查洗钱以切断反政府街头运动的海外资金流动,援引“亵渎君主罪”拘捕和起诉新生代示威领袖等诸多举措。

中美两国对当前泰国保守阵营重构“泰式民主”观念的核心诉求,延续了此前泾渭分明的外交立场。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始终尊重泰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与实践交流”^③,为泰国提供行之有效的发展思路。对此,巴育政府给予了积极回应,不仅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线,积极推进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发展,^④而且在治国理政方面认真借鉴中国经验,甚至要求内阁成员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⑤

与此相对,美国在拜登当选总统后,再次回归价值观外交,从而关闭了特朗普时期的“去意识形态化”窗口期,使得2017年巴育应邀访美形成的有利态势未能得到延续。更严峻的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升级,拜登政府奉行的价值观外交要比奥巴马时期更为强硬。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民主峰会”,其目的就是为了构建民主人权统一战线,以所谓“美式民主”为标准划分阵营,从而对华形成遏制。^⑥作为东南亚唯二的军事盟友,菲律宾在备受争议情况下受邀参加,而泰国“民选政府”却未入选受邀国家名单,从而明确传递了美国对“泰式民主”的否定信号。对此,泰国副总理兼

① 周方治《“泰式民主”的转型困境》,《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第126-135页。

② “Local Media Puzzled by CNN’s Impromptu King Interview”, *Khaosod English*, November 2, 2020, <https://www.khaosodenglish.com/politics/2020/11/02/local-media-puzzled-at-cnns-impromptu-king-interview/>.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联合新闻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11月5日, https://www.fmprc.gov.cn/zyxw/201911/t20191105_347424.shtml.

④ 周方治《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世界》2019年第7期,第69-74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在曼谷正式发行》,新华网,2017年4月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08/c_1120773816.htm.

⑥ 韦宗友、张歆伟《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4页。

外长敦表示,民主峰会纯粹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操弄,泰国没有收到邀请反而应感到高兴。^① 尽管基于重塑联盟体系的客观需要,拜登政府随后在对泰立场上有所缓和,但“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分歧,始终是两国难以弥合的重要裂痕。

从中美泰三角关系来看,当前美泰间的意识形态关系,已从冷战时期的相互包容,转变为排斥对立。随着泰国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步入新阶段,是否有利于重构“泰式民主”的社会共识,将成为保守阵营选择外交立场的重要基准。由于美国以“美式民主”划分阵营的做法短期内难以改变,从而很可能使泰国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保守阵营,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动延续此前“友华疏美”的外交立场。

(二) 以经济与安全为两翼

从评估来看,经济与安全分别是中美影响力相对占优的关键领域。^② 因此在有关泰国外交政策研究中,通常被视为对冲策略着力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刻板印象。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泰国政治主导集团对内外情势感知及相应诉求变化,无论经济还是安全领域的中美影响力权重都将在双多边互动过程中持续摆动,并有可能接近甚至越过“临界点”,从而为“非中性”对冲提供高度灵活的政策两翼。

1. 对外经济合作:以产业结构提质升级为优先目标。2019年,泰国主流媒体曾邀请经济领军人物针对中美战略竞争及其影响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分管经济的时任副总理颂奇、前泰国贸易代表潘普里(Panpree Phahitthanukorn)、泰国商会副主席威猜(Wichai Asarasakorn)、泰国工业联合会副主席克里昂格莱(Kriengkrai Thiannukul)、泰华农民(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朝瓦(Chow Kengchon)、渣打证券研究部专家披雅萨克(Piyasak Manasan)等官产学研知名人士。总体而言,各方共识是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不可避免,并将在经济领域对泰国形成严峻挑战,使得既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结构性压力,短期来看泰国经济难免承压受损,但中长期来看却是产业结构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泰国社会、企业与政府都应为此做好积极准备。^③

过去十多年泰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泰经济合作的长足发展。其中,中泰贸易额从2001年65.7亿美元猛增到2018年802.2亿美元,增幅高达12倍,成为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泰贸易额在泰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占比也持续攀升,并于2007年与2013年相继赶超美日两国,中国已连续8年保持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见图2)。与此同时,作为泰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持续繁荣也受益于中国游客的持续高增长。2019年,泰国接待国际游客约400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近1100万人次,约占1/4强,并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大国际游客来源国地位。^④ 商品贸易与赴泰游客都直观地体现了中泰经济合作的显著成效,从而成为泰国“经济上靠中国”刻板印象的现实依据。

^① Masayuki Yuda, “Thailand Belittled again as U.S. Ostracizes it from Democracy Summit”, *Nikkei Asia*, December 9, 2021,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Turbulent-Thailand/Thailand-belittled-again-as-U.S.-ostracizes-it-from-democracy-summit>.

^② 周方治《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东南亚“地缘引力结构”解析:路径与方法》,《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63-71页。

^③ “จากสงครามการค้าสู่สงครามเป็นวิกฤตโลกครั้งที่เศรษฐกิจไทยต้องเผชิญ”, ไทยรัฐฉบับพิมพ์(《从贸易战到冷战:泰国经济必须面对新的全球危机》,《泰叻报特别报道》), 2019年5月20日, <https://www.thairath.co.th/business/economics/1571098>.

^④ 数据来源:泰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tatbbi.nso.go.th/staticreport/Page/sector/EN/report/sector_17_11101_EN_.xls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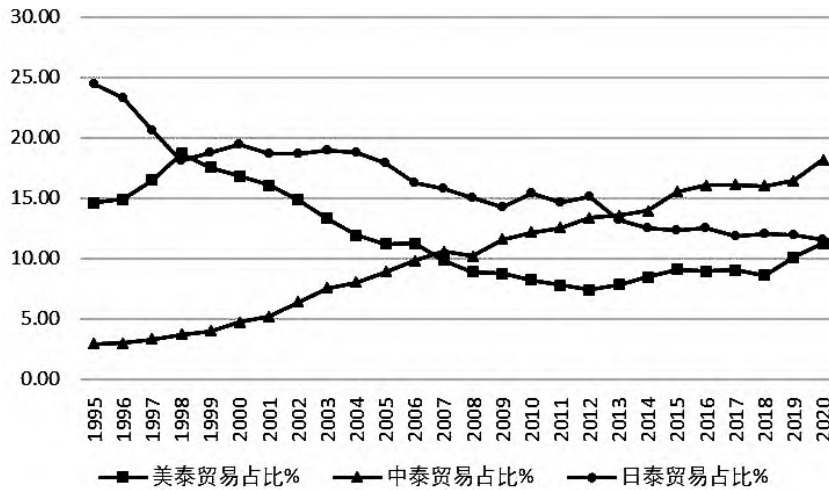


图2 泰国双边贸易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 泰国(中央)银行网站, 2022年9月4日 <https://www.bot.or.th>。

但要指出的是, 中泰经济合作的持续高增长态势, 一方面是中泰双方在体制机制上深化合作的成果,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体量在 21 世纪初跨越式增长的外溢。从 2002 年到 2020 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1.47 万亿美元猛增到 14.72 万亿美元, 增幅高达 10 倍, 并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① 换言之, 过去十多年泰国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之所以收益丰厚, 很重要的前提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于是, 这就引发了重要争议: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叠加中美战略竞争的负面影响, 泰国是否有可能或有必要延续“经济上靠中国”的既有模式。对此, 泰国亲美势力与政府反对派倾向于美国立场, 认为在经济上对华合作将提升中国的经济优势, 有可能增加泰国“脆弱性”。^② 2020 年初, 针对巴育内阁的不信任辩论中, 反对派就明确提出巴育政府对华合作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应当暂缓并进行检讨。^③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有关趋势限制对华经济合作的“杂音”更是在美西方支持下甚嚣尘上。

与此相对, 泰国保守阵营基于固权的现实需要, 采取了更为积极但也有所调整的对华经济合作立场。巴育政府指出,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以联通亚非欧经贸与投资,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则推动印太战略, 双方都在争取对中小国家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泰国要平衡与各方关系, 并积极利用地理优势, 将国家经济政策与互联互通相结合, 从而在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下获得增长动力与发展契机。^④

相较于既往, 当前泰国在对华经济合作方面, 除了进一步深挖贸易与旅游潜力之外, 更加重视投资, 尤其是契合泰国 4.0 规划的十大创新产业的高新技术投资。对泰国而言, 尽管中国直接投资

①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ชินดนัยธีระพันธุ์พิเชษฐ, “จีนกับการใช้เครื่องมือ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การต่อรอง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钦达奈·提拉潘披切特《中国利用经济优势作为外交工具》) *MFU Connexio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8, No. 1 (2019), pp. 299-339.

③ Aekarach Sattaburuth, “Govt too Submissive to China”, *Bangkok Post*, February 26, 2020,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865574/govt-too-submissive-to-china>.

④ นโยบายและแผนระดับชาติว่าด้วย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ห่งชาติ พ.ศ. ๒๕๖๒ - ๒๕๖๕ (《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2019—2022)》)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泰国总理府, 《政府公报》第 136 卷第 124 辑 2019 年 11 月 22 日 第 4 页。

头寸并不高,不仅远低于日本,而且也略低于美国,但呈现加速上升态势,从前景来看,明显要比经历了持续高增长的贸易与旅游拥有更高的成长天花板(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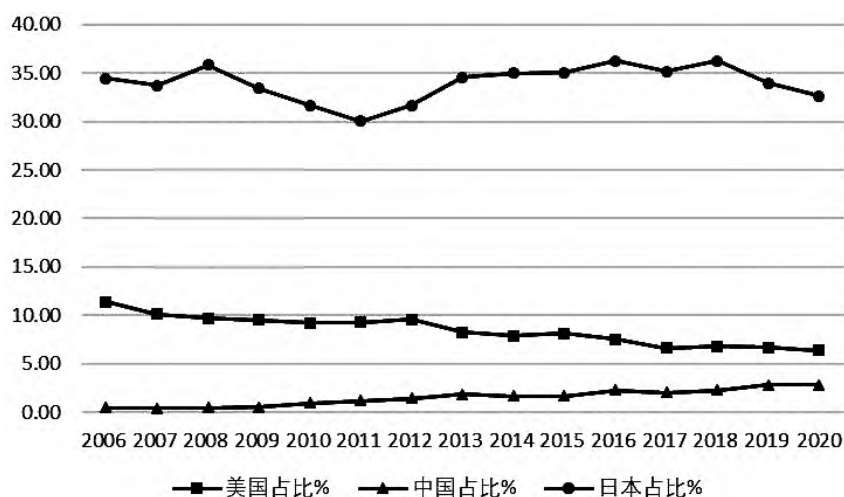


图3 泰国外国直接投资头寸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2022年9月4日, <https://www.bot.or.th>。

更重要的是,当前全球迎来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泰国如果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避免“未富先老”的不利前景,就必须把握国际产业链重组契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提质升级。^①这也是泰国保守阵营特别是曼谷政商财阀借以巩固政治主导地位的有效路径,有助于抢占国家发展前沿,从而在生产层面遏制新兴权力集团的成长与壮大。近年来,巴育政府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尤其重视“东部经济走廊”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很关键的就是要在军政府时期设立的“特区”上做文章,为保守阵营注入创新产业的发展动力,从而提升其在“新时期”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创新型红利分配能力。

2. 对外安全合作:以冷战遗产置换重组为运筹手段。作为军事盟友,泰国与美国长期保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冷战前期特别是越战时期,美泰军事安全合作达到顶峰。基于对政治主导地位面临颠覆威胁的情势感知,泰国保守阵营与美国进行了安全领域的“交底线”合作,不仅允许美国在其领土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而且在武器装备、人员培训、部队指挥、情报收集等方面深度捆绑,试图借此获得美军的安全承诺。尽管随着越战失败,美泰军事联盟有所松动,甚至在冷战结束后长期处于漂移状态,直到21世纪初的反恐战争时期才有所回暖;但军事盟友关系作为冷战遗产却得以保留,并成为“安全上靠美国”刻板印象的历史根源与现实依据。

不过,对泰国保守阵营而言,虽然美泰军事盟友在纸面上一如既往,1954年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亦称《马尼拉条约》)与1962年泰国外长塔纳特(Thanat Khorman)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签订的《塔纳特—腊斯克公报》依然生效,2004年以来泰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也未改变,但曾经支撑军事盟友关系的政治逻辑却不复存在。近年来,美国对泰国保守阵营的固权举措持否定甚至抵制立场,使得在事关政治主导权的核心问题上,美国从泰国保守阵营的“庇护者”

^① ยุทธฤทธิ์ บุณนาค, อนุชานนท์ สิมบุญสืบสาย, ธนิษฐา สุขกล้า, “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ทาง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ระหว่า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 กับ จีน: นัยต่อภูมิภาคเอเชียตะวันออกเฉียงใต้และไทย”(育塔瑞特·布恩纳克、纳查依·利姆布纳瑟布赛伊、塔尼萨·素卡拉《中美科技竞赛:对东亚与泰国的影响》),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ISC)*, No. 3 (2021), pp. 1-17.

转向“干涉者”，从而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美泰安全合作的再次漂移，以及中泰安全合作的重要进展。^①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升级，泰国保守阵营在对外安全合作方面，展开了对冷战遗产的置换与重组，以形成更适度的大国距离。对此，2021年出任陆军副司令的阿披难(Apinun Kumproh)上将曾发表题为《中国梦与全球安全》的专稿加以阐释。作为长期负责国防政策与规划工作的高级军官，阿披难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泰国保守阵营的情势感知与共识。阿披难指出，中美战略竞争就本质而言是发展道路竞争，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中国比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的美国更有道路吸引力。他同时强调，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对中国遏制围堵，势必引发地区紧张态势，泰国要发挥纽带作用，但要保持适度距离，以避免被大国(美国)安全利益捆绑被迫“选边站”。^②

具体来看，一方面是置换，使泰国在对外安全合作上更多元化，以改变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过度依赖。近年来，泰国军备购置的多元化成效显著。数据显示，1950年至1974年泰国海外军购基本为美国所垄断，1975年至2004年美国年均占比也高达49.47%，但2012年至2020年美国占比已降至11.29%，中国占比则增至15.92%，此外乌克兰、韩国、瑞典、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分享了与美国相近甚至略高的军购份额。^③与此同时，近年来美泰军事联演联训在规模与频次上都呈下降趋势，而中泰军事联演联训则是持续提升，相继创设“打击”陆军联演(2007年)、“蓝色突击”海军联演(2010年)、“鹰击”空军联演(2015年)、“联合·突击”特种部队联演(2019年)，从而有效提升了中泰安全合作的深度与广度。^④

另一方面是重组，使美泰安全合作偏向非传统安全，以更好服务于保守阵营的国内固权与维稳诉求。对泰国而言，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根深蒂固，其中很关键的就是美式培训的持久作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每年培训的泰国军官多达1500名以上，冷战后期的培训规模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依然保持在每年350名左右。^⑤21世纪初，曾接受过培训的泰国军官累计多达2.1万名。^⑥现任泰国陆军司令、陆军副司令、空军司令、国防部次长等军方高层，都曾赴美短期或长期研修。这就意味着，泰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很难经由“置换”改变美国安全影响力优势地位。

于是，通过议题设置与制度建构，将美泰安全合作的庞大存量资源引导到保守阵营掌握更多主动权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尽可能规避中美战略竞争的地缘安全压力，也就成为当前较理想的“一举两得”策略。一来有助于缓解“美式民主”价值观外交利用美国安全影响力优势地位施压；二来有助于借助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等正当理由，为保守阵营压制反对派提供行动框架。近年来，颇具代表性的“重组”工作是“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ISOC)的重建与改组。其前身是冷战时期在美泰安全合作框架下设立的“反共指挥部”(CSOC)。21世纪初以来，随着政治权力结构

① ธนพล คงเจียง,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กองทัพไทยกับกองทัพจีนในยุคคณะรักษาความสงบแห่งชาติ (คสช)”, วารสารการวิจัย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การพัฒนา (塔纳蓬·孔鉴《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时期的中泰军事关系》,《发展管理研究杂志》), Vol. 10, No. 2 (2020), pp. 98-109.

② อภินันท์ คำเพราะ, “ความผันผวจีนกับ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ของโลก” (阿披难·卡姆颇《中国梦与全球安全》), NDC Policy Brief, Vol. 4 (2017), pp. 17-39.

③ 资料来源: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新华社,2019年7月24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

⑤ Jennifer Morrison Taw,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Case studies in US IMET Training and Its Role in Internal Defense and Development”, Santa Monica: RAND, 1994, p. 22.

⑥ Michael Connors,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yond Hegemony?”, in M. Beeson (ed.), *Bush and Asia: Americ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42.

调整,保守阵营对其进行了体制机制“重组”,使之成为在基层重塑“泰式民主”社会共识的前沿力量,并取得初步成效,甚至引起政府反对派的强烈不满与质疑。^①

(三) 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纵深

对中小国家特别是小国而言,国家体量与大国相差悬殊是影响其对冲策略有效性的首要难题,很容易在大国地缘引力作用的牵扯下偏离初衷,从而失去战略腾挪空间。尽管泰国自视为“中等国家”,但相较于中美两国而言体量依然相去甚远。为此,泰国始终强调区域/次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借此拓展本国战略纵深,从而一方面以合作利益为缓冲,化解中美战略竞争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以合作机制为杠杆,发挥“1+1>2”体量扩增效果(见图1)。具体做法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依托区域合作,降低对冲风险。任何对冲策略都不可能无风险套利,泰国采取“非中性”对冲更难免引发大国不满。事实上,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只字未提泰国,不仅没有将其列入“核心联盟”范畴,而且在“加倍努力在世界各地建立伙伴关系”的权重序列中,也位列印度、新西兰、新加坡甚至越南之后,成为“东盟其他成员国”的泛指概念。^②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对泰国近年来“非中性”对冲的不满情绪。

于是,依托区域合作构建战略纵深,强化“东盟中心地位”——即东盟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地区政治与安全架构、处理域内外大国关系以及地区议程设置和秩序塑造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③——以抱团方式冲抵美国“选边站”的地缘政治压力,成为泰国的必然选择。2019年,泰国发挥东盟轮值主席国作用,通过与印尼默契配合,促成了东盟国家共识,发布了《东盟印度洋—太平洋展望》,从而有效提升了东盟在印太战略下的话语权与影响力。^④

其次,争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主动权,增加对冲筹码。对泰国而言,东盟区域合作主守,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主攻。由于在东盟框架下,老东盟除泰国外都是海岛国家,并且从体量上看印尼是天然战略重心,因此,尽管东盟合作对泰国具有重要价值,但泰国很难有效发挥其功能,长期以来都是扮演“敲边鼓”与“和事佬”角色,守有余而攻不足,难以成为对冲策略的战略支撑。但在中南半岛,情势则截然不同。泰国不仅地处战略腹地,而且是湄公河次区域五国中的唯一中高收入国家与老东盟国家,拥有明显的“领头羊”地缘优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构想,湄公河次区域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角力场,各类区域合作安排架床叠屋,日本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印度推动的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MGC)、中国推动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LMC)、美国推动的湄公河下游倡议(LMI)等,彼此竞争甚至相互掣肘。^⑤这对泰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从水资源到环境保护,从扶贫开发到移民权益,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面临的诸多议题为泰国提供了充足的对冲策略“筹码”。为此,巴育政府近年来依托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简称“三河流域机制”,ACMECS)积极争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主动权,试图抓取更多

^① “The Power of the Military over Civilians Remains: Five Glaring Issues and the Change of ISOC’s Role in the Aftermath of NCPO’s Dissolution”, *Thai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 (TLHR)*, September 26, 2019, <https://tlhr2014.com/en/archives/13935?lang=en>.

^② Joseph R. Bide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 10.

^③ Hiro Katsumata, “What Explains 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Community Building?”, *Pacific Affairs*, Vol. 87, No. 2 (June 2014), pp. 247–264.

^④ 刘琳《东盟“印太展望”及其对美日等国“印太战略”的消解》,《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4期,第72–90页。

^⑤ Jürgen Rüländ and Arndt Michael, “Overlapping Regionalism and Cooperative Hegemony: How China and India Compete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Issue 2 (2019), pp. 178–200.

“筹码”。2018年,泰国作为三河流域机制的首倡国和时任主席国,提出并促成越老柬缅等参与方通过该机制建立15年来的首个五年总规划(2019—2023)。^①2020年,巴育总理在第九届三河流域机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设立三河流域机制发展基金与成立三河流域机制秘书处的规划建议。^②泰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完善三河流域机制制度化建设,使之能有效承载次区域合作的利益协调职责,从而成为对冲策略的战略支撑。

最后,营造亚太跨区域连通想象空间,放大对冲杠杆。从印太战略的视角来看,泰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微妙。尽管东西两侧分别濒临印度洋(安达曼海)与太平洋(暹罗湾),但泰国与连通两洋的最关键水道马六甲海峡却存在一定距离,因此理论上被视为战略要冲,但事实上却很难以此为“筹码”施展对冲策略。

从历史来看,泰国基本上对“有名无实”的战略要冲颇为满意,因为在大国博弈的罅隙间涉险对冲,收益高但风险也不低,并不利于政治主导集团的固权与维稳。不过,如果局势需要,泰国也会以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开凿运河/搭建路桥”可行性为议题,主动营造连通两洋的地缘想象空间,从而放大对冲杠杆,以获取短期地缘红利,但通常都会在风险攀升前令相关议题无果而终。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泰国国内经济形势衰退明显,保守阵营在固权与维稳方面的成本持续上升。2020年,巴育政府拨付530万美元用于泰国南部“路桥计划”的可行性研究。2021年,泰国交通部宣布可行性研究通过内阁审定,并将于2022年公布全盘规划。随即,泰国交通部长经由中国驻泰大使,对华提出了推进“路桥计划”的合作信号。^③

四、泰国“非中性”对冲反转的风险防范

在过去十多年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的地缘政治情势下,泰国选择了“非中性”对冲,一方面是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内因决定,另一方面则是中美发展道路差异的外因使然。尽管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泰国“友华疏美”外交立场有其内在稳定性,但如果仅靠体系惯性,并不能保证其“非中性”对冲不会发生反转,甚至在美国引导下回归冷战时代的亲美立场。2022年以来,拜登政府明显加强对泰工作,不仅于5月邀请巴育总理访美参加美国-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而且于7月国务卿布林肯访泰期间签署了《美泰战略联盟与伙伴关系公报》及《关于促进供应链弹性的谅解备忘录》,从而释放了缓和价值观分歧的政治信号,并为推进印太经济框架铺平了道路。^④

为此,有必要抓住当前有利态势,推进中泰战略合作深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地缘引力的作用效能。具体来看,建议重视以下方面:

其一,依托中老泰铁路建设促进地理连通。中泰虽为近邻,但地理上并不接壤,因此在地缘关系上始终存在一定隔阂。尽管地理位置无可改变,但中老泰铁路有助于双方地理互联互通,从而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物质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助力。随着中老铁路建成通车,中泰铁路建设也有望提速,但要充分发挥铁路的地理连通效果,还需要大量后续的软硬件配套工作,方能有效整合各方

^① 《中南半岛三河流域合作机制提出首个五年总规划》,新华网,2018年6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7/c_1122997475.htm。

^② “PM Proposes 3 Points of Cooperation at 9th ACMECS”, Royal Thai Government, December 9, 2020, <https://www.thaigov.go.th/news/contents/details/37493>。

^③ “Govt Wants China in on Key Projects”, *Bangkok Post*, December 21, 2021,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235147/govt-wants-china-in-on-key-projects>。

^④ “United States-Thailand Communiqué on Strategic Alliance and Partn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2020, <https://www.state.gov/united-states-thailand-communicue-on-strategic-alliance-and-partnership/>。

资源,促进中老泰铁路“客流、物流、资金流”的繁荣有序运转,并以此为纽带切实提升中泰地缘引力作用。

其二,落实“东部经济走廊”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促进产业融通。中泰经济合作目前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关口,能否从“做大规模”进一步提升为“做强产业”,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中泰战略合作的强度与韧性。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中泰高层共识,但要具体落实还需要项目引导、产业扶持与企业参与,方能促进政策与市场衔接,避免“抽屉式”倡议错失时机。通过产业融通,将为泰国提供分享中国“双循环”发展红利的重要契机,同时也将夯实中泰战略合作的政治根基。

其三,提升新生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促进民心相通。中泰战略合作当前主要是依托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的保守阵营,但从中长期来看,新生代始终将是影响中泰关系走向的决定力量。近年来,由于泰国保守阵营与新生代极左翼运动存在政治冲突,再加上美西方通过媒体特别是社交平台“信息茧”加以误导,使得泰国新生代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疑虑甚至抵触情绪。对此,有必要通过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智库与媒体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交流,以本土化语言与表达习惯,为泰国新生代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准确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其自主探求更适合泰国的发展道路,改变对美西方的偏听偏信,从而为民心相通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责任编辑:占冰]

Thailand's "Non-neutral" Hedging in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Features, Causes and Trends

ZHOU Fangy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As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escalate, Thailand has repeatedly reiterated its traditional hedging strategy.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Thailand triangle relationship, its strategic focus has clearly shifted in the direction of being pro-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Thailand's "non-neutral" hedging is derived from the endogenous tension of the adjustment of its domestic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show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aking the conservative ideology of 'Thai democracy' as the benchmark, taking the economy and security as the twin wings, and taking the regional/sub-regional cooperation as the strategic depth". In the medium and long run, for China to prevent Thailand's "non-neutral" hedging reversal,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Sino-Thai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geographic connectivit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Key words: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ailand, "Non-neutral" hedging strategy